

20 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去工业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 罗振兴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基础和关键动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去工业化与工业化相反，指一个社会或地区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经济中地位和作用下降的过程。去工业化通常以制造业产出和就业数量的绝对萎缩或它们各自在总产出和就业所占比例的下降来衡量。美国作为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其工业化水平曾经高居世界首位，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始推行去工业化，直到 2010 年左右才结束，这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也为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了警示。

美国为何要去工业化。大量研究表明，美国去工业化主要源于 20 世纪后期服务消费需求激增、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外包服务增多等因素。1970 年美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 3715 美元。当时美国的汽车、洗衣机、冰箱、收音机等耐用品的家庭普及率都达到了 80% 以上，对商品的需求接近饱和状态，对服务消费需求快速上升，服务消费占个人消费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从 1970 年的 50.7% 左右提高到 2010 年的 67.7% 左右。同时，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快速推进，美国国内一些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工厂陆续关闭或转移到海外成本更低的地方，以及按功能而非按部门专业化进行的离岸外包，跨国公司将设计、研发和销售等制造业的核心活动保留在发达国家，将加工和组装等非核心业务分散到全球更有效率和成本优势的地方生产。在 1970—2006 年间，美国从南方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占其国内制造业总产出的比例从 0.6% 上升到 13.2%。经济学家大卫·库塞拉等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由于南北贸易的增长，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 200 万个。

但这些解释，往往忽视了美国政府的因素，正如扬斯敦州立大学的学者约翰·鲁索和雪莉·李·林肯指出的，“去工业化并非新鲜事。它也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遵循传统的关于自然经济演化的历史叙事。……

去工业化是企业 and 政府决策的直接结果”。美国政府确实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

美国政府推动去工业化的种种举措。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等几届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加速了去工业化的进程。

放松金融管制和维持强势美元等政策抑制了制造业发展，并造成了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的结果。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放松金融管制和长期维持强势美元政策，导致金融业的利润率远高于制造业，逐利的资本纷纷转向“挣快钱”的金融业。例如，从 1975 年到 1990 年，私人固定资产投资转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即 FIRE 产业）的比例翻了一番，从 12%—13% 上升到 25%—26%。从 1982 年到 1990 年，近 25% 的固定资产投资转向了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

缺乏长期和可持续的产业支持政策，是美国重工业迅速丧失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1986 年，里根政府终止了自二战以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普遍实行的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待遇，对美国重工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实际上，从里根政府至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它们或取消或削弱对重工业的产业支持措施，如补贴和出口信贷、税收支出、价格支持等，加快了这些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落败。

盲目鼓励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税收政策。美国税收政策鼓励海外投资，特别容易造成逐底竞争、监管套利、腐败和逃避责任的恶果。而跨国公司为了追求短期利润，尽可能地在全球转移生产，利用不同国家法律和监管的漏洞和不一致性，进行避税、转移利润，这种行为尤其需要监管。比如，小布什政府时期通过的《2004 年美国就业创造法》部分条款放宽海外税收抵免规则，扩大了延迟缴纳税收的范围，鼓励美国跨国公司加大海外投资和转移生产等。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公司在避税天堂获得的利润暴增了 69%，给美国纳税人造成了至少

400 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去工业化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美国去工业化这一长期、持续的进程，尤其是 21 世纪初的加速推进，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是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大规模流失。去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着工厂关闭、向海外转移或自动化程度提高，直接的后果就是数百万高薪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和大规模的失业。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私人撤资或美国企业迁移，直接导致 3200 万至 3800 万个工作岗位消失。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从 1970 年的 25% 左右下降到 1993 年的 15%。制造业就业人数从 1979 年 1942 万人左右的历史峰值，下降到 1993 年的 1678 万人左右。老牌工业化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受到工厂倒闭的打击尤为严重，比如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失业率从 1978 年的 8.3% 攀升至 1982 年的 20.3%。

其次是工资增长停滞。大部分服务业提供的新就业岗位通常工资较低、福利较少，造成工资增长停滞，减少了中产阶层数量，加剧了社会不平等。1973 年至 1995 年间，美国生产和非管理类员工的平均实际工资（经通胀调整后）下降了 10%。比如，失业的汽车工人两年后发现，新工作的薪水平均比他们原来的工资低 43%。

再次是地方税基下降和经济长期不振。由于工厂关闭和人口迁出，严重依赖传统工业的地方政府的税基下降，不得不削减警察、消防、教育和基础设施维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地方经济陷入长期不振的局面，经济转型难以实现。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是美国的“铁锈地带”，涵盖美国五大湖区域的传统重工业衰败区域。在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美国五大湖地区因为水运便利、矿产丰富，成为重工业中心。在 20 世纪后期开始的去工业化浪潮影响下，制造业的外迁加剧了产业的空心化，这些地区多因经济结构过于单一而陷入发展困境。

再就是导致产业失衡，国际经济地位下降。由于大量的中低端产业转移到海外，传统的重工业也衰败，而

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无法弥补这些缺口，往往容易引发经济空心化，造成产业失衡，甚至危及依赖工业的国防工业，国际经济地位最终也下降。在 21 世纪初，经通胀调整后的美国 19 个制造业部门中有 13 个总产出下降。其余 6 个制造业部门中，有 3 个产出增长低于 GDP 增速。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全球份额从 21 世纪初的 25% 下降到 2014 年的 18.4%。

更为严重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以后，信息革命突飞猛进，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低端制造业，同时美国试图牢牢把控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加强金融霸权，导致美国经济进一步脱实向虚，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和过度金融化，最终引爆了 2007 年的次贷危机和 2008 年的金融海啸，美国制造业也因经济危机陷入了谷底。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 2000 年的 1727 万人左右一路下跌至 2010 年的 1151 万人，减少了 570 多万人。同期，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从 13% 左右下降到 9% 左右。此后，美国开始意识到过度去工业化的问题，在奥巴马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开始进入再工业化阶段，重新重视和强化制造业的重要作用。

制造业在经济中具有基础和核心地位，是经济繁荣的支柱和技术创新的主体，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去工业化的经济后果警示世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平衡好传统制造业和现代制造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不能过早去工业化和过度去工业化，更不能丢失制造业这个发展根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主任）



（上接 1 版）统一政府行为尺度，规范和压缩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政府采购等领域的自由裁量权，避免分散决策的政策碎片化所导致的市场分割，为各类企业营造出稳定透明平等的制度环境。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基本需要。统一数据、技术等要素市场推动劳动力、资本跨区域流动，解决“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通过建立全国联动的市场监管网络，统一监管执法的形式，遏制低价无序竞争和各种地方保护，引导企业专注技术创新而非“政策套利”，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畅通经济循环、增强内外双循环韧性的基本需要。通过破除区域壁垒，“五统一”促进了商品和服务在全国范围内高效流通，形成供需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一开放”则推动制度型开放，一方面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规则，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另一方面强化国内市场取向的改革力度，增强民营企业进入能力，有助于本土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

赋能新质生产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需要。统一大市场消除了“内卷式竞争”，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统一标准体系为各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提供统一技术规范，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规范税收优惠等内容在内的财税体制改革，引导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培育增长新动能。

“五统一、一开放”是从“破障”到“立新”的系统性改革、重塑和升级，既是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关键抓手，也是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选择。其核心在于通过统一规则、开放赋能，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深度融合，最终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经济循环畅通、国际竞

争力提升的多重目标。

聚焦“五统一、一开放”存在的核心短板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出台以来，“五统一、一开放”在各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如在基础制度领域与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改革上，形成了“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竞争公平”的制度框架与治理格局；在基础设施领域，形成了“通道+枢纽+网络”的立体流通、交通、通信等支撑体系；等等。但经营主体和民众普遍反映，目前对这项改革的建设成效感知与预期之间存在着明显落差，可感知、可触及、可享有的实际利益即获得感不足。

立破并举机制衔接不够顺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获得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处于“破”的攻坚阶段，地方传统的财税补贴、招商优惠等政策受到统一大市场规则的严厉约束逐步退出，替代性的产业政策如全国性的创新基金、普惠型支持工具等尚未形成基本的规模，政企双方陷入旧模式失效、新模式未立的困境。

市场规模拓展滞后于市场规则统一，阻碍市场潜在效能的充分发挥。政策规则“五统一、一开放”作为改革的快变量，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市场规模扩张这一慢变量却因制度供给不足而出现明显的滞后，形成“规则先行、容量未扩”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企业陷入“存量内卷”困境。超大规模潜在市场优势未能转化为增长动能，导致企业利润压缩、青年就业困难、消费者预期谨慎等不利于稳增长的现象。

政策执行统一规范与执法尺度之间，实际存在各种“区域差”。地方性标准与国家强制性标准并存，且各地对国家标准理解、执行尺度不一，

使企业在全国经营面临合规成本倍增。部分地方存在选择性执法、地方保护执法、趋利性执法，通过设置歧视性资质要求、设定不合理技术标准、实施变相许可备案、推行特定地方品牌推荐目录等方式，对外地企业、产品和服务形成“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在能源、通信、交通等部分领域存在行业隐性垄断与歧视，地方性国企或特定经营主体利用优势地位，对外部竞争者设置接入障碍或实施不公平交易行为。

要素自由流动受制于制度壁垒，各种保护主义隐性存在。部分地区通过税收返还、土地优惠等变相设置壁垒，干部考核 GDP 权重仍占主导，导致重复建设和“内卷式”竞争；要素市场分割依然突出，数据要素流通存在“数据孤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尚未完善，企业数据确权规则不明确；监管协同与执法效能不足，跨部门数据共享率不足 40%。

在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国内市场开放相对不足。尤其是对本国国民和民营企业开放不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需市场扩大、本土企业活力和竞争力。这些痛点直接导致经营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风险上升、预期不稳；民众在消费选择、就业迁移、公共服务享有等方面感受到不便、不公与不确定性，极大地削弱了对统一大市场建设成效的正面感知。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践路径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已从“立柱架梁”进入“积厚成势”阶段，需以“五统一、一开放”为抓手，破解地方保护、要素分割等深层次矛盾，通过制度型开放重塑国际竞争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财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和信用体系联动改革。改革增值税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机制，适当减少地方对增值税依赖，推进消费税改革，增加地方政府对消费端的投入，促使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向市场建设转移。

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试点将公平竞争、促进要素流动及其效率等指标纳入干部考核指标，降低对 GDP 增长的考核权重。

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对招商引资项目进行一定的政府扶持不是不行，而是要公开、透明化。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建立“低价无序竞争”的标准，以行业的平均成本为预警线、以可变成本为底线的衡量低价无序竞争的标准，规范企业市场行为。

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攻坚战。加快数据要素确权立法，尽快启动全国“数据要素×”大赛，推动医疗、金融等领域的数据流通。完善土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扩大建设用地使用权二级市场试点。

加强监管机制创新与能力提升，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监管大数据平台，尽快实现 90% 以上涉企数据共享。推行“监管沙盒”模式，包容审慎对待人工智能等新业态。

推进高水平开放与国内外规则对接。以海南自贸港为支点，试点 CPTPP 劳工、环境条款，尽早加入 DEPA 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加强国际标准合作，推动新能源汽车、5G 等领域中国标准国际化。着力推动外贸一体化发展，畅通出口转内销路径，培育一批内外贸优质企业。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首席专家）

区域国别学是我国 2022 年设立的一级学科，以各区域或国家的各领域状况为研究对象，旨在加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和交流。区域国别研究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天然地具有学术上的紧密联系。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独立出来以后，区域国别学的现实基础、自身的学科定位及基本分析框架，仍然需要放在世界史的纵深视域中作出新开拓。

世界历史的新发展是区域国别学的现实基础。我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的现实基础，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新形态，即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永续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典型的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化推动人类横向交往的新发展。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挑动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复杂化。在人类社会又一次面临和平还是战争、繁荣还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的关键抉择之时，区域国别学应当主动参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学术解读与阐释，展现应有的专业价值。

为此，发挥好世界史学科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的作用，应当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这不仅两个一级学科的相互促进，而且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之一。世界史学科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的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世界史学科的全球视角有利于区域国别学确立学科定位。新時代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是运用世界史学科的全球视角，立足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累区域国别学专业知识。中国是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和执政党章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大国。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区域国别学与西方殖民时代起源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以促进人类文明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为宗旨，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抓手，积极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发挥应有的学术作用。

目前，各国人民面临全球性的共同挑战，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蓬勃开展。西方学界至今没有形成能够解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框架，其区域国别研究依然固守自身利益优先的立场，把其他区域和国家视为次一等的、被凝视的观察客体。这已经不数时代之用。我们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应当重点关注的是如何解决地缘冲突、增进交流互鉴、共同实现现代化等主题。例如，已有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状况持续恶化，2023 年全球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为 28.9%，较 2015 年增加 7.4%；23.26 亿人无法定期获得足够食物，较 2015 年增加 7.31 亿人。粮食不安全人口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南亚、北非和西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要应对这些迫切的、结构性的全球挑战，既要梳理其中复杂的历史脉络，也要分析内在的现实阻碍。区域国别学传统视角中的地缘经济、需要转化、升华为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如卫生合作伙伴关系、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开放包容伙伴关系、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廉洁共建伙伴关系等新态势，以便加快各区域、各国共同发展。区域国别学研究显然能够在扩大各国利益汇合点、促进国际协调与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大有可为。

世界史学科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区域国别学探索自身框架。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交叉学科，自身的理论分析框架正在探索之中。就此而言，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是借鉴世界史学科的分析框架，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公平正义理念，进而围绕实现全球治理形成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框架。世界史学科的分析框架，是由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构成的纵向与横向结合的时空分析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

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的作用

□ 董欣洁

发挥世界史学科

论与“世界历史”理论的集中呈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要落地，需要区域国别学从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公平正义理念出发，深入探索世界各区域、各国的自主发展动力和互联互通的现实路径。这也是区域国别学的基本研究内容。

我们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应当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化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积极促进共兴文明、共筑安全、共赢共享。目前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持续向亚太地区转移。作为全球格局中的稳定板块，亚太地区不仅保持近半个世纪的总体和平，而且是全球经济繁荣的重要引擎，亚太地区促和平、求稳定、谋发展的现实经验，特别是对话协商处理分歧和争端的经验，需要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深入挖掘和发扬。例如，因水而生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就是一项非常典型的多边主义合作。澜湄流域六国同饮一江水，合作共赢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六国确立了“3+5 合作框架”，即坚持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协调发展，优先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领域开展合作。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使澜湄合作成为地区合作优质的“金色平台”。澜湄流域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了共同维护和发展。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和国家间良好的政治互信、文明互鉴，是全球治理的坚实基础。区域国别学正在探索的自身学科理论分析框架，也将在这些具体研究中日益清晰。

综上所述，区域国别学研究既在关注世界范围内区域和国家的实践多样性，也应在此基础上提炼分析世界范围内人类整体发展的统一性。这与世界史学科的总体研究思路是一致的，也是双方可以协同发力之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